



198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
六届副主席刘澜涛（前排左三）到我县视察时与县政府、县
政协等领导合影留念。

（陈正荣摄）

yt108/25

目 录

东流麓突围战·····	龙德源 梁超好 (1)
争取一个国民党将军·····	<u>梁寂溪</u> (7)
抗日期间护军火 门楼村民受嘉奖	
·····	黄天理口述 蒙成干整理 (16)
广西军抗日点滴·····	莫孔传 (18)
甘献恩智打鬼子兵·····	甘煥文 (21)
广西学生军在宾阳·····	韦志伟 (22)
昆仑关抗日纪念塔(碑)文录·····	吕继池辑 (27)
宾阳县国民中学·····	
·····	陈全德 (35)
新宾中学的前身——培福中学·····	陈全德 谢肇文 (38)
为革命殉难的白汉云烈士	
·····	白鹏举等人口述 继池整理 (41)
我所知道的伯父陈良佐	
·····	陈天杰口述 陈振宝等整理 (44)
清代女诗人陆小姑·····	蒙成干 (48)
宾阳壮锦史话·····	
·····	蒙成干 (59)
抗日前的宾阳汽车客运业·····	伍文惠 (62)

宾州城的由来和发展	朱渔夫 (64)
芦墟简史	县志办供稿 (66)
解放前宾阳农田水利概况	龙润燕 (69)
宾阳天主教简史	黄玉玫 (74)
宾阳基督教会的概况	石愈坚 (77)
葛翁岩	白光南 (80)
遗爱桥	陈洪盈 (82)
遗爱桥被炸亲历记	陈洪盈 (85)
1947年—1949年宾阳县府施政简况	吴旭明 (87)
思村群众智擒知州何兆葵	陈全德 蒙成干 (90)
施村胜利节	施树杭 (92)
何必恭的“启事”	江一清 (94)
辣椒桥	甘涣文 (95)
庙联辑录	封家朝等 (95)

东流麓突围战

龙德源 梁超好

1948年冬，桂中南地工委将现宾阳县露墟乡田僚村后背约五公里处的东流麓，作为培训各县干部的场所。

为保证训练场所的安全，当时地工委布置了三道情报防线，以防敌人突然袭击。一是在六卢乡附近设立情报站，负责监视六卢乡敌人的动态；二是布置田僚村的情报站，放出瞭望哨，观察敌情；三是在东流麓营地，加强警戒。由于防范工作做得好，所以三期培训班都比较顺利。到1949年元月底，参加培训的同志都已回原地。杨烈同志也领武工队离开东流麓，到外地去开展工作。

营地被围

1949年3月中旬，杨烈同志率领武工队20多人重返东流麓，准备召开各县特支负责人会议。当时，虽然已在六卢布置情报站监视敌人行动，并在田僚派出瞭望哨，加强警戒。但只注意公开的，忽视了伪装的，被敌人钻了空子。1949年3月31日上午，伪装看牛的敌探份子、田僚村村长黄龙的胞弟黄云松发现武工队的住地后，立即跑到六卢乡公所向其哥黄龙和永淳县民政科长覃瀚报告，覃又将此情报向永淳县自卫大队副司令兼宾阳、永淳、横县联防副主任黄尚元报告。

敌人获得这一情报后，黄尚元就亲自带领驻扎在露墟

乡、甘棠乡的永淳县自卫大队1、3中队，省保安队一个连，永、宾、横三县联防民团及六卢乡长陈廷玉、乡队副陈泽世带领的乡警共3百多人，由黄龙带路，连夜奔袭东流麓，对我实行武装包围。

由于敌人行动诡秘，我们没有觉察，甚至3月31日夜间，应邀到田僚村过壮族三月三节的杨烈同志，在4月1日凌晨，返回东流麓时，也没发觉营地已被敌人包围。天亮后，杨烈同志督促武工队长韦振广检查山上岗哨。韦带两名战士，正准备登山，便听到东面山上哨兵高喊：“同志们，有敌人来包围了！”接着，西边山高地的敌人用机枪向我哨兵扫射，我哨兵立即还击。一场突围战斗就此开始了。

胜利突围

在不明敌情的紧急关头，杨烈同志沉着镇定分析敌情，果断地指挥武工队突围。从枪声判断我北边山上的哨兵还击南边山敌人这一情况说明，敌人还没有占领北面高地。杨烈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从北面高山突围。命令韦振广带一个班，迅速登上北边山，增援哨兵，用火力压下南面敌人火力，掩护突围。令副队长刘鼎忠同志带一个班作殿后，掩护地工委机关突围。

在突围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冒着敌人的枪弹，冲上山顶。从麓底到半山腰，树林茂密，敌人难看清我军突围方向，只是对着营地茅棚盲目扫射。因而，我部队能够安全冲到半山腰。可是，从半山腰到山顶，既无树木，连草也是低矮的。部队完全暴露了。而从麓口登北边山的敌人，已占领南侧高地，正和我军争夺制高点。敌人用轻、

重机枪向我突围队伍猛烈射击。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志们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密集枪弹冲向山顶，抢占制高点。快到山顶时，山坡陡峭，行速减慢，敌人的子弹在同志们身边“啾啾、嗖嗖”地掠过，尘土飞扬。“瞄准高佬，打！”敌人发现了杨烈同志这高大目标，疯狂地叫嚣着。子弹雨点般落在杨烈同志的前后左右。紧靠杨烈同志身边的警卫员张世香同志中弹倒下，滚下麓底牺牲了。杨烈同志爱人刘洁明大姐小腿也中弹负伤，共产党员、班长廖万华在抢占山头时也不幸中弹，大腿骨折，不能行走。当同志们要抬他走时，为了不拖累大家，他执意不肯，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你们要保护好黄参谋（即杨烈同志）、刘大姐等领导同志。快，你们快走！”说完，他抱枪翻身滚下山麓，壮烈牺牲。

“同志们，把距离拉开，快点冲出敌人火力网！”在几个同志中弹伤亡后，为了减少伤亡，杨烈同志命令队伍散开队形，一齐冲出去。这时，队长韦振广带领哨兵和梁超好、农乃基、苏进芬等同志，已率先冲到山顶，占领了制高点，向敌人猛烈射击，压制了敌人火力，掩护部队冲过敌人火力封锁地段。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部队终于胜利突围。但共产党员、副队长刘鼎忠同志，在率队掩护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轻机射手黄国荣同志因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撤不出阵地而被俘，被敌人押至六必坳杀害。

部队突围到第二个山头后，同志们提出要把刘大姐抬着走。刘大姐坚决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又对杨烈同志说：“杨烈同志，你要全心指挥队伍安全突围，不要为我一个人拖垮队伍呀！”杨烈同志也从革命大局着想，抛开私

情，决定将刘大姐原地隐蔽下来，并指定武工队指导员龙德源同志负责此事。龙德源将刘大姐安置在一个长满茅草不易发现的旱坑里。安置好后，当部队继续撤到第三个山头——那利山时，发现敌人从那曲向我袭来。我军占领阵地后，杨烈同志找武工队领导和本地战士商量部队去向和行军路线，大家一致意见，走六羊坝、大五山、六庄村、稔桥线路，把部队撤回横县老区。下午一时左右，部队到达坝浪山麓休息，派本地战士黄时荫等同志进村发动群众送来糯米饭和茶水。部队正在吃饭，那曲、六造村村长陆永珍带领民团向我袭来。经我还击，敌人狼狈逃窜。哨兵黄广才同志负轻伤。午饭后，队伍朝六庄村、榄桥方向前进。到达壮帽、佛子树林时，夜幕已降临，队伍在村外树林里休息，派梁超好和黄时荫两同志进六庄村发动群众筹粮做饭。晚上九时左右，队伍进村吃晚饭。在吃饭时，杨烈同志找队长、指导员研究，决定部队饭后立即行军，在天亮前必须赶到横县北区那罗村，想办法找到韦世多同志的武工队；留下龙德源、梁超好、黄时荫三同志，寻找刘大姐等负伤同志和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杨烈同志还指出，留下的同志要首先到田僚村找“枧水三哥”（地下党负责同志黄有益），请他派出几名群众，一同到东流麓找刘大姐等几位伤员，将他们抬回田僚村，然后，由枧水三哥找六卢“七叔”安排给伤员治伤，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同志。完成任务后，即回横县找队伍。

在回横县途中，到达灵竹墟附近的大里桥时，天快亮了。如部队继续前进，白天行军，暴露目标，必将遭到敌人追击。若就地宿营，靠近敌人据点，群众基础不好，很不安全。怎么办？为了使部队不被敌人发现，安全到达目的地，

杨烈同志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到那罗村集中。天亮后，杨烈同志由彭子盛同志警卫，由于人生地不熟，不知那罗村的方向，就沿着灵竹至青铜的公路前进。途中遇到一个犁田的农民，便向他问路，说自己是国民党的逃兵，想到那罗村找亲戚。农民同情地指着前面不远那条村说：那罗村就在那里。杨烈同志走到村边，见到了韦世多同志和他带领的武工队。韦世多同志派武工队员梁廷仍同志随同彭子盛同志化装成扫墓群众，去联络分散隐蔽行动的同志。当晚，同志们都安全到达那罗村。两支武工队会师后，转移到六味村宿营。

敌人企图在东流麓围歼我桂中南地工委领导机关的计划被彻底粉碎了。我军取得突围战的胜利。

安置伤员

留下的龙德源、梁超好、黄时荫等三位同志，当晚住在六庄村，了解到进犯东流麓的敌人已全部回六卢乡和露墟乡驻扎，田僚村已无敌人。次日，三人扮成上山扫墓的群众，到达田僚村，找到祝水三哥，向他叙述东流麓战斗情况，传达杨烈同志的指示。祝水三哥随即和龙德源等同志装扮成上山“扫墓”的群众，直奔东流麓刘大姐掩藏地点。经六必坳时，发现张世香、黄国荣两同志的尸体，同志们用树枝和茅草将尸体盖好，向烈士默哀后，进入东流麓。见到刘大姐时，她安然隐藏原处未动。刘大姐在这里忍着伤痛和饥渴已经一夜又两个半天，一见到战友，相互都激动得潸然泪下。刘大姐知道部队胜利突围，非常高兴，对牺牲的同志万分悲痛，对治伤问题，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接着由龙德源、梁超

好把刘大姐背下山。黄有益、黄时荫继续寻找刘鼎忠、廖万华两同志的下落，终于在半山腰和麓底先后发现了两同志的尸体。经过商量，决定黄有益同志先回村了解情况后到六卢村找黄以尊七叔，发动群众上山掩埋烈士尸体。其余三人轮流背刘大姐回田僚村。到村如到家，地方党的同志及基本群众，知道刘大姐受伤后，都来看望慰问，忙着给刘大姐端水、喂饭、治伤。六卢“七叔”及参加突围战斗的本地战士张锡侦同志也及时赶到田僚村看望刘大姐。安排落实好对刘大姐治伤措施后，龙德源、梁超好两同志就赶回横县。第三天回到龙平、永安根据地跟上了队伍，向杨烈同志汇报了安排大姐治伤和掩埋牺牲同志遗体的情况。杨烈同志听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次战斗，教训沉痛呀！我们牺牲了几个好同志、好战士。只是靠同志们的英勇奋战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持，才能取得突围胜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呀！”对于他自己在战斗中的正确果断指挥，只字未提。同志们对他这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博大胸怀，更加敬仰和受到教育。

（本刊转载，略有删改）

争取一个国民党将军

梁 菽 溪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党组织的布置，我打入南宁民团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做争取中将指挥官梁翰嵩的统战工作。

梁翰嵩是广西宾阳人，在桂系的高级将领中较有资历。不过他在桂系中并不得意，不象夏威、梁朝玘等人善于钻营，飞黄腾达。他却不顾“上峰”的脸色，敢于主持正义，敢凭自己的爱好意见办事，喜怒自成一格。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人管他叫“梁神经”，大概与他这方面的性格有关。

记得当时党组织在确定这个任务时，曾对梁翰嵩这个人作过认真分析。那时，梁翰嵩有一件事给人印象很深，1938年夏，中共南方局派莫西凡同志来南宁。莫西凡同志来到南宁后刚开始工作，就被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主任李朝芳手下的特务盯住了，不久便连同南宁私立行健中学的一位党员同志李沛星一道被捕入狱。当时在南宁能和李朝芳抗衡的只有梁翰嵩。党组织便通过梁翰嵩的侄儿梁炎昌请梁翰嵩出面营救。梁翰嵩认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应该团结抗日，不应随便以共党嫌疑的名目捕人。他亲自从指挥部所在地武鸣赶到南宁，据理力争，要求李朝芳放人。李朝芳说要公事公办，他火了说：“我是南宁地区的行政长官，你抓人得通过我，不放不行。”李朝芳见梁翰嵩态度很硬，抓的人又缺乏足够

的证据，只好把人放了。从这事可以看出，梁翰嵩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敢于主持正义，对国共合作和抗日大业是有诚意的。另外在平日工作中他很注意乡村建设，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所办的修桥筑路、建设墟亭和种树造林，都办得顶认真。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他算是有抱负有头脑的一个爱国将领。党的统战工作的中心思想是爱国主义。梁翰嵩所具有的这些性格特点和气质，正是一个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我对于完成这个任务十分乐观。

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使我和梁翰嵩的关系密切起来。一次梁炎昌告诉我，梁翰嵩叫参谋处和政治部起草一个关于指挥部由武鸣迁南宁情况的报告，不合他心意，要我不妨拟一个由他交给梁翰嵩，这事我认真办了，想不到这份报告竟博得他的赏识，不但一字不改地签发了，而且立刻约见我。我主动利用了这个时机，开始了对他的争取工作。从此，我和梁翰嵩的接触便多了起来。我便经常用党的抗日主张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看法去影响他，他很听得进。1939年春，我得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由于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和汪精卫的出走投敌，大都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动摇。根据《论持久战》的精神，我特地找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介绍他看了这本书。事后他告诉我他很认真地读了这部著作，认为书中的分析透彻，见解精辟，说他最赞赏书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思想，他要按照这个思想来搞民团工作。

当时在南宁，党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剧团、声歌协会、妇女救国会纷纷成立，用各种形式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思

想，抗战的气氛很浓。这些活动梁翰嵩都很支持。他的夫人宁辉也参加了妇救会的活动。

梁翰嵩有两个尽人皆知的癖好，一是题字，一是训话。他的草书确是写得不错，训话则枯燥乏味，而且每到一处四乡男女群众都要集中听训，群众十分反感。学了《论持久战》后，我随他下去几次乡，题字、训话还是照旧，不过却不强调集中群众听训了，说：“不可劳民”。认识到这点，对他来说倒是十分难得的。

这期间，有两桩事情至关重要。

1939年夏，党从香港打通法国总督的关系，经越南海防运来一批华侨捐献的物资，需经南宁朝贵阳方面运往延安。这批物资以医疗器械和药品作掩护，其中夹有不少重要的电讯器材，这是当时党中央急需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亲自赶到南宁，料理这批物资过境。党组织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我特地赶到邕江对岸，只见十几辆满装物资的车辆，停在西园一带。司机都是华侨模样，听说都是些从海外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李克农同志中等身材，穿着便服。我见了他，他要我在这批物资通过南宁时给予关照。当时香港汪精卫的特务追踪而来，桂系也得到风声想染指这批物资。通过梁翰嵩的关系，这批物资顺利地运出了南宁。不料运到庆远时，却被扣留了。庆远民团指挥部来电查问这批物资的来历，很有留难的意思，我知道后立即找到梁翰嵩，并对他说，这批“药材”是爱国华侨捐献给友军的，应该放行，这关系到团结抗日的大局，关系到争取海外华侨共同抗战的问题，并指出庆远指挥部是想打这批物资的主意，他们收实惠却把破坏抗日的政治责任推给梁指挥官。梁翰嵩听了，对庆远

方面的做法很不满，他要我用他的专用代号“浩川”，复电庆远方面，要他立即放行。后来获悉这批物资最后安全运到延安，梁翰嵩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1939年11月19日，日寇为了打通湘桂路这条线，从钦州企沙登陆进攻南宁。梁翰嵩被任命为邕钦前敌总指挥。南宁地下党根据日寇入侵的紧急形势，要我负责争取梁翰嵩在民团指挥部的建制下成立配备武装的战时工作团，以便为进一步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好准备。为这事，我曾找梁翰嵩谈过三次。成立战工团他当时主要有两个顾虑。一是怕没有先例，别的指挥部没有战工团，自己搞了会显得特殊，广西绥靖主任公署不但不会批准，还会遭受非议。我跟他说明成立战工团是根据南宁即将成为战区这种特殊情况决定的，完全站得住脚。估计到形势的发展，吸收一些青年做民众工作，对于开展战区的政治工作非常必要，可以“先斩后奏”。他觉得有理。二是怕经费没有着落。我说可以不按正规建制发饷，每人每月发九元生活费，这样一百人才花九百元，二百人也不足二千元，指挥部本身就可以解决。他经过考虑便接受了，还主动提出经费从机动费中开支。指挥部的机动费向来是指挥官的额外收入，他能慷慨解囊，足见他和那些只图私利的官僚不同。于是由他兼任团长，我兼任副团长的战工团就这样成立了。党派了吴光华、阮集群、梁善棠、刘洁明、李沛澄、何日先等同志参加，并分别担任了秘书、干事、队长等领导职务。战工团的成员基本上是党员。尔后，南宁沦陷，战工团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战工团的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炽烈的爱国热情，使梁翰嵩十分赞赏。战工团有一位姓雷

的团员在扶绥战地病故，他就曾亲到战工团吊丧、慰问。

国民党吏治腐败，各级官吏贪生怕死，敌人入侵后，县乡政权几乎陷于瘫痪。梁翰嵩对这种局面深有感慨，他叫我把战工团的同志分到上思、扶南、同正、绥禄（即现扶绥县）及邕宁县的那陈、那齐、唐极等县乡，成立政务督导团，检查和督促各县的战时工作。经过战工团党组织研究，派了何日先、张声震、梁持亚、雷达等同志带领督导团到各县工作，梁翰嵩还有准备借助战工团，实现他整顿吏治的思想。他几次向我表示要给县、乡政权的人事来个大换班。他很想建立一个象《论持久战》所描绘那种抗日民主的政权。不过这种想法，由于不久他被免掉总指挥的职务而无法付诸实现。但是，战工团在这个地区所播下的火种却成为一股坚实的力量而存了下来。

他被免去邕钦前敌总指挥职务，表明了李白桂系对他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当然与他接受党的影响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分不开。较直接的原因还同他接受党的倡议成立战工团有关。在战工团成立不久，反动派就已经注意他了，并曾专门派广西学生军政治特派员肖光保率学生军第三团到上思县来监视。碰巧，战工团成立前，学生军第三团有个党员暴露了，撤回南宁，战工团成立时，党组织安排他参加战工团。这事被肖光保侦悉，便以抓逃兵为名带了几十条枪来抓人，企图直接打战工团，间接打击梁翰嵩。这事最后由梁翰嵩出面解决了。他明确指出，因为战况发生变化，一个战士无法回到原建制，参加战工团，是抗日行动，不是逃兵，可由战工团派人送回去，学生军不能乱抓人当作逃兵处理。他以果断的措施，保护了这个党员的生命。当反动派的挑衅已涉到自

身利害的情况下，他仍然维护团结抗日的旗帜，这在当时曾经使我们很受感动，当然，也正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就更为恼火。大概是1940年春节后，他到合山参加白崇禧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回来，便向我透露了将被免去民团指挥官职务的消息。对他的被免职他并没有丝毫后悔和埋怨。他认为，他依靠的战工团都是爱国的，而做的事又都是从抗日大事着想的。他一再向我表示今后工作难做的情绪，流露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我提出准备先行辞职离开，他同意了，要我做好各种准备。于是我就在他被免去南宁民团指挥官职务前离开他去田阳县教书了。战工团的同志们也在党的妥善安排下陆续离开了。我走后，他被正式免除了南宁指挥官的职务，调去担任一个毫无实权的校阅小组的副组长。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回顾这段时间我们对梁翰嵩的工作，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凭着党的政治主张和统战政策的威力，我们不但完成了争取梁翰嵩的支持推进抗日工作的任务，而且还使这位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逐步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成为党的可靠朋友。最后他还为了掩护我们的游击队，竟和我党的一位党员一道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了说明这点，我还得作些非常必要的叙述。自从我们在南宁开始和梁翰嵩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后，地下党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党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梁翰嵩由他侄儿梁炎昌出面在黎塘办了一所“开智中学”，掩护了我党部分同志。一九四四年，日寇二次入侵广西，他从桂林行辕回到宾阳指挥附近几个县抗击日寇，周可传、卢哲、梁宁、梁炎昌等党的同志也参加了他主持的保卫乡土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解甲还

乡，1946年我在开智中学教书，经常见到他。当时旧政协在南京开会，他想去南京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去南京会见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是好的，但想当国民政府的官恐不可能。他从南京回来后告诉我，他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必武要他回广西做策反工作，支援人民斗争，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7年贵县、武宣起义后，我转战到宾阳见到他。他听到我们起义的消息，连声叫好，把他家中的枪枝弹药大部分支援了我们。这时再用不着更多的语言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他告诉我他对国民党的一套已经绝望，国家的唯一希望在共产党。以后地下党继续在横县、宾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时，他更是热情地给予支持。他的村庄成为游击队的据点，他的家则成为游击队设置唯一能够收听延安消息的收音机和出版快报的机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人民武装斗争，他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有次见面我曾劝他去香港找李济深，结果没有成行。后来他提出要到粤桂边区司令部，当地党组织曾派交通员黄威带着他去，但是到了永淳，由于他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交通不安全，只好劝他返回。之后，他继续掩护，支持游击队。

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抽调保一团和宾阳、贵县地方武装团队“扫荡”我宾、贵地区的游击队，他的家乡宾阳县新梁村是我游击队据点。敌人层层包围了新梁村，他指挥村中的武装群众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我游击队曾连续两夜解围，掩护刘洁明等同志和群众撤走，但他和在家收听延安消息的游击队员唐启明同志没有能够突围，在他家坚持战斗，最后被国民党杀害了。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血和一个共产

党员的血，就这样流在一起，凝结在一起，一个长期接受党的主张，和党合作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是值得怀念的。

（转载1981年7月22日《广西日报》）